

第一章 综 述

一 关于史料

与五代时其他几个南方国家相比，吴越国的史料应该说是比较丰富的，保存至今、或新近出土的实物资料即有不少。吴越国的秘色瓷名扬天下，不少越窑窑址至今尚存，越窑青瓷在国内外也屡有发现；吴越国佛教发达，不少与佛教有关的建筑、雕塑被保存至今，佛教经卷也屡屡出土^②；而且，吴越国已有多座钱氏王室与大臣的墓葬被人发现，墓中有瓷器、天文图等珍贵的文物^③。此外，唐昭宗赐给钱镠的铁券、投龙简、水府告文和其他文书等也能被人

金祖明：《浙江余姚青瓷窑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汪济英：《记五代吴越国的另一官窑》，《文物》1963年第1期；绍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绍兴上灶官山越窑调查》，《文物》1981年第1期。等等。

史岩：《杭州南山区雕刻史迹初步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俞剑华、罗赤子、于希宁：《杭州五代宋元石刻造像复勘后的一点意见》，《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王伯敏：《西湖飞来峰的石窟艺术》，《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工作队：《杭州慈云资贤寺摩崖龕像》，《文物》1995年第10期；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文物》1978年第12期。

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师范学院考古组：《杭州郊区施家山古墓发掘报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杭州三台山五代墓》，《考古》1975年第3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临安板桥的五代墓》，《文物》1975年第8期；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字款白瓷》，《文物》1979年第12期；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看到^①。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吴越国的经济、艺术、技术和信仰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宋人对五代历史做了一些文献整理工作，范质撰《五代通录》；太祖时官修《五代史》即今之《旧五代史》此后又有王禹偁《五代史阙文》、尹洙《五代春秋》、欧阳修《五代史记》（即今之《新五代史》）等史著。《五代通录》系范质依传世的五代实录撰成，卷帙不菲，惜其书失传于今；王、尹二书则过于单薄；今天，人们研究五代历史最可依恃的还是新、旧两部《五代史》。

由于五代上承唐朝，因此，有关唐朝的历史著作中也有不少五代的记述。后晋时已有官修《唐书》（即今之《旧唐书》）北宋朝廷重修即今之《新唐书》。两《唐书》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上述四部正史都保存了不少吴越国的史料。相比之下，《新唐书》、《新五代史》的优点是叙事简洁明快；《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中又增加了一些内容，是《旧五代史·钱鏐传》所没有的。但仅从史料角度而论，似以《旧唐书》、《旧五代史》为胜。两书里面保存了不少原始文献，如《旧五代史》中就收录了钱元瓘给唐明宗的一道奏章本纪部分，《新唐书》与《新五代史》太过简略，《新唐书》系时虽远较《旧唐书》准确，但错系者仍有不少，且不及两部旧史详尽。

宋人编写了一些大部头的类书，也有很高史料价值。《册府元龟》在这方面尤为突出，里面即有不少五代的内容，多据正史直接编成。由于今天传世的《旧五代史》已非完帙，因此《册府元龟》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里面有关吴越国的内容也复不少，尤其是关于吴越与五代王朝使节往来的一些记载多不见于其他文献，非常可贵。

刁鸿翔：《关于钱鏐铁券的流传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2期；黄天钟：《关于钱鏐铁券流传问题的补充》，《文物》1959年第4期；黄涌泉、王士伦：《五代吴越文物——铁券与投龙简》，《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吴越银龙简》民国四年上海艺苑真赏社金属版印；《水府告文考释》，《东南文化》1993年第3期；王士伦：《五代吴越的两件文书》，《文物》1960年第1期。

此外，宋人勤于整理档案、修撰当代史，如会要、实录、国史等等极多。吴越至太平兴国三年（978）纳土归宋，其时距宋朝建立已有十八年，宋朝的这些文献中自有很多有关吴越国的记载。尽管原始的资料多不存于世，但清人徐松所辑《宋会要辑稿》，却保存了宋朝会要中的一些资料。此外，南宋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元人所修《宋史》，对宋朝实录、国史多有采择，其中有不少吴越国后期的历史记录。

正史类作品中，除上列诸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辽史》。其中有一些契丹与吴越交往的记载。

但是，上列诸书虽然宝贵，然其所记内容以北方王朝为主，有关“十国”的史料极不充分。以吴越国而言，《旧五代史》有《钱镠传》，《新五代史》有《吴越世家》此外本纪中有一些中原王朝对吴越君臣的任命材料，列传中有一些中原使节出使吴越的材料，仅此而已。为了弥补这些不足自《旧五代史》问世之后，有关“十国”的历史著作就不断问世。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部，一为陶岳的《五代史补》，一为路振的《九国志》，一为刘恕的《十国纪年》。

《五代史补》共五卷，收罗了五代时的一些轶闻故事，颇能弥补正史的不足，但失实之处也有不少。

《十国纪年》司马光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世称路氏《九国志》在五代史之中最佳，此书又过之。以予考之，长于考异同，而拙于属文。其书国朝事皆曰宋而无所隐讳，意者各以其国为主耳。”^①则此书有两大优点：一是“长于考异同”，用我们现在的的话来说，是一部实证的作品；二是身为宋人而对宋“无所隐讳”。对一个修史家来说这两点是最可宝贵的。而且，《十国纪年》卷帙甚富，有四十二卷之多。里面对吴越国大概也会有丰富的记载和扎实的考证，竟不传于今。可惜！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本卷七《伪史类》十国纪年条。

《九国志》依司马光的看法 它与《十国纪年》相比似乎颇有不同 但此书篇幅庞大 有五十一卷 更胜《十国纪年》 里面的内容大概也极为丰富。可惜此书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也佚失了。今天虽有《九国志》 是清人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 仅存一百三十六篇传记，其中吴越部分仅杜建徽、鲍君福、成及、顾全武、黄晟五传。尽管如此，此书对吴越国的研究仍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第一，该书有不少记载与其他文献如《资治通鉴》、《吴越备史》等不尽相同 可资参证 第二 该书辑出时间在《十国春秋》成书之后 里面有些内容也为《十国春秋》所无；第三，后世有关南唐的记载极多，而对吴国的记载极少，该书收录吴臣传记有四十四篇之多。而吴、南唐同吴越边界相接，双方和和战战，恩恩怨怨，关系错综复杂；尤其是吴与吴越，两国的建国历史密切相联，很难断然把他们分割开来。《九国志·吴》的四十四篇传记，其中即有不少吴越建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其中的两个传主陈璋、高澧还是吴越的叛臣。

除此三书外，宋人曾撰十国国别史多部，如楚有《三楚新录》、《湖南故事》 闽有《闽王事迹》、《闽王列传》 蜀有《锦里耆旧传》、《蜀梲机》 南唐更多 徐铉有《江南录》 郑文宝有《江表志》、《江南近事》 陈彭年有《江南别录》 龙衮有《江南野史》 马令、陆游各有《南唐书》一部。这些著作，大部分今天仍能看到。由于南唐、吴越相邻，其中便有关于吴越的记载，马、陆二《南唐书》中更多。

当然，在宋人整理的各种文献中，对研究吴越国史最为重要的还得数《资治通鉴》。上述二类宋人所修史书，前者以五代为主，十国史料匮乏；后者虽以十国为主，但多散佚不全，各有缺点。而《资治通鉴》正好将两类缺点加以弥补。它取材十分广泛，其中有关吴越国的记述就极其丰富，有很多记载甚至是《吴越备史》所没有的，加上取舍精严，实为我们今天研究吴越国史的必备史籍。

有关吴越国的史料，一个突出之点是吴越王室的私家著述特别丰富。宋朝统一中国之后，对十国遗族实行怀柔政策，但十国之

后大多衰落不振，独有钱氏一门，由于主动纳土归朝，富贵不绝，一直继续到宋朝灭亡。钱俶纳土请命，使他被视为宋朝的功臣。钱俶入朝的第二年，太宗北征太原，伤亡惨重，心中颇有所感，因对钱俶说道：“卿能保全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①因此较之其他降王，他在宋朝受到了更高的礼遇和荣誉，钱氏子弟“奏名于有司，近三千人，诏许文武自择其官，于是佩印绶而侍轩墀者，逮及其半”^②。宋太宗以后的一些皇帝也认可了钱氏所谓的忠勋功业。真宗就称钱氏“继世忠顺”。天禧四年（1020），他对钱惟演说：“卿一门忠孝，与常人异，先帝待以殊礼，朕安敢忘？”^③到南宋时，钱氏仍然受到当朝眷顾，宠荣不绝，高宗曾亲书“忠孝之家”四字以赐之。^④而且，钱氏子弟多有文才可称者，留下著作甚多。要之，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史乘类作品，见于记载者还有如下数种：

（1）钱俨《忠懿王勋业志》三卷，见《宋史》卷四八《吴越世家》。钱俨是文穆王钱元瓘之子。

（2）钱俨《吴越备史》十二卷。

（3）钱俨《备史遗事》五卷。

（4）钱俨《戊申英政录》一卷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史部·传记类》：“婺州刺史钱俨撰，记其兄俶事迹，俶以戊申正月嗣位。”《十国春秋》卷八三“本传”谓“若干卷”。

（5）钱俨《贵溪叟自叙传》一卷，见《宋史》卷四八《吴越世家》。

（6）钱易《钱氏家话》一卷 见《十国春秋》卷八三《钱易传》。钱

《宋史》卷四八〇《吴越世家》中华书局点校本 第 40 册 第 13904 页。

钱惟演：《庆系谱序》，《钱氏家乘》卷一《序言》第 18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六宋真宗天禧四年闰十二月乙卯条，中华书局点校本 第 7 册 第 2231 页。

④ 《宋史》卷四六五《钱忱传》第 13589 页。

易是忠懿王钱弘俶之子。

(7)钱惟演《秦王贡奉录》二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史部·传记类》：“枢密使吴越钱惟演希圣撰，记其父俶贡献及锡赉之物。”《通志》卷六六《艺文略》地理类与《宋史》卷二 三《艺文志》作一卷，清人叶德辉辑《宋秘书监续编·四库阙书目》卷一《传记类》作二卷。以上三书俱题作《钱王贡奉录》。钱惟演是忠懿王钱俶之子。

(8)钱惟演《家王故事》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七《史部·传记类》：“钱惟演撰 记其父遗事二十二事上之 以送史院。”

(9)钱惟演《逢辰录》二卷 见《宋史》卷三一七《钱惟演传》。又《直斋书录解题》卷七《史部·传记类》作《玉堂逢辰录》。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一：“太宗既得吴越版籍 继下河东 天下一统 礼乐庶事，粲然大备。钱文信惟演尝纂书名《逢辰录》，排日尽书其父子承恩荣遇及朝廷盛典，极为详尽。”可知《逢辰录》也是记载钱俶事迹的一部史书。

以上诸书大多已不存于世，即有存于世者如《吴越备史》、《家王故事》、《逢辰录》也篇帙不全。

此外 尚有《五国故事》、《葆光录》二书 虽非钱氏子弟的作品，却是吴越国人所作，也可归入吴越国自撰史书一类。《五国故事》二卷 是一部国别体史书 分记杨行密、李昇、王建、孟知祥、刘?、王审知六国史事，合前、后蜀为一国，故称《五国故事》。书中“留从效”皆作“娄从效”，乃是避钱镠之讳，以此估计是吴越国人的作品。《葆光录》 题陈纂撰 多记唐末、五代初年的两浙史事 且称钱元瓘为“太宗”，应当也是吴越国人所作。但前者所记主要是五代时期除吴越外其他南方诸国史事，虽也涉及吴越，毕竟数量很少；后者所记之事多涉神怪，不可尽信。两书的史料价值非常有限。

第二类是家谱。钱氏家族的第一次大规模修谱活动是在钱镠时期 修成《大宗谱》。《大宗谱》的一些人物传记至今仍保存在罗隐

的文集当中。但《大宗谱》主要是追述钱氏先世 直接记述吴越国的内容非常少。钱氏家族第二次大规模的修谱活动是在宋朝初年,其时吴越国已经不复存在。修谱活动由钱俶之子、曾在宋仁宗初年担任枢密使的钱惟演主持,谱修成后进呈仁宗皇帝,赐名《庆系谱》。《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有钱惟演《钱氏庆系谱》二卷;《通志》卷六六《艺文略》谱系类则说是一卷 此外又有《钱氏庆系图》二十五卷 无撰人。据钱惟演天圣五年(1027)所撰的《庆系谱序》谓“谱所載始于武肃王者 尊大功 正世统也”^①。可见《庆系谱》是《大宗谱》的续作 其记载吴越国的史料应极为丰富。南宋时 钱象祖重修《庆系谱》^②。原来的《庆系谱》虽不传于今,但后世所修钱氏宗谱追述先世多以《大宗》、《庆系》二谱为其源头 因此我们从它们身上仍能直接或间接地看到《庆系谱》的面目。

吴越国纳土归朝之后 钱氏子孙繁衍 派系蔓生 各修宗谱。这些家族或迁或居 其宗谱或存或灭 都不能一一穷考。民国时 安徽广德人钱文选辑《钱氏家乘》(于民国十三年(1924)成书)。《钱氏家乘》以钱氏广德溧阳一宗所传家谱为主,又广泛收罗钱氏其他宗系的谱录、历史文献 约成此书 分《序言》、《宸翰》、《像赞》、《图考》、《年表》、《家训》、《传记》、《遗文》、《艺苑》、《古迹》、《轶事》、《世表》、《支派》、《祠产》共十四卷 内容非常丰富。其前十一卷 所记所考内容都与吴越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尤其是《年表》、《家训》、《传记》三卷 所记内容不见于其他的历史文献 非常可贵。除《钱氏家乘》外 钱文选还纂辑《钱氏家谱》(全称《吴越钱氏溧阳小庆系谱》)五十四卷,撰有《钱武肃王敷治吴越功德史》等书。

当然,引用家谱的材料,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即是其史料的可靠性。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本来应该抛弃一切功利动

^① 见《钱氏家乘》卷一《序言》第18页。

钱象祖:《庆系谱上接大宗世系谱图记》,《钱氏家乘》卷一《序言》第19页。

机，但在古人的世界中，修谱常常是为了教化、为了光宗耀祖等现实利益服务，虚美隐恶，篡改历史，皆在所难免。但是，家谱对生卒婚姻与生育等等中性事件的记述往往可信，而且很多内容很难从其他文献中找到，加上家谱中往往包含一些失传的资料，如《钱氏家乘》卷六《家训》与卷八《遗文》中即收录了不少钱镠的文章 为其他文献所不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如六一二《世系》中有钱镠父亲钱宽的一则传记，从其行文风格推测，似据当时的碑铭资料写成 也十分可贵。又如诸暨的《江藻钱氏宗谱》就将《吴越备史》全文收入《年表》中，《吴越备史》今虽存于世 但此谱所收仍有助于今人对此书的校勘、阅读。

第三类是钱氏子弟的文集。自钱镠起，钱氏四世文集，见于记载者有如下数种：

(1)钱镠《吴越王石壁记》二卷，《宋史》卷二八《艺文志》别集类作一卷，卷二九总集类作二卷。

(2)钱元瓘《锦楼集》，《旧五代史》卷一三三“本传”：“元瓘有诗千篇 编其尤者三百篇 命曰《锦楼集》 浙中人士皆称之。”

(3)钱俶《正本集》，《宋史》卷四八《吴越世家》：“在吴越日，自编其诗数百首为《正本集》，因陶谷奉使至杭州，求为之序。”

(4)钱俨《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 见《宋史》卷四八《吴越世家》。

(5)钱昱《贰卿文稿》二十卷 见《十国春秋》卷八三“本传”：“钱昱是忠献王钱弘佐之子。”

(6)《钱惟治集》十卷 见《十国春秋》卷八三《钱惟治传》：“钱惟治是钱弘侬之子，钱俶养子。”

(7)《钱昆集》十卷 见《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一七“本传”：“钱昆是钱弘侬之子。”

(8)钱易《金闺》、《瀛海》、《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 见《宋史》卷三一七《钱惟演传》附《钱易传》。《咸淳临安志》卷六五《人物·钱

易》：“有集一百六十卷”。钱易也是钱弘侬之子 钱昆之弟。

(9)钱易《滑稽集》四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集部·别集类》：“翰林学士吴越钱易希白撰 多谲识之辞 淳化癸巳自序。”《宋秘书监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作“五卷”；《宋史》卷二 六《艺文志》将之列入小说类 作“一卷”。

(10)钱惟演《伊川集》五卷 见《宋史》卷二 八《艺文志》及《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集部·别集类》。《文献通考》卷二三四《经籍考》作三卷。《咸淳临安志》卷六五《人物·钱惟演》作《伊川汉上集》。

(11)钱惟演《拥旄集》五卷 见《宋史》卷二 八《艺文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集部·别集类》。

(12)钱惟演《枢密集》五卷，见《宋秘书监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咸淳临安志》卷六五本传作《枢密》、《拥旄》前后集。

(13)钱惟演《典懿集》三十卷 见《宋史》卷三一七本传。《宋秘书监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作《彭城典懿集》三十卷。

(14)钱惟济《玉季集》二十卷 见《宋史》卷四八 《吴越世家》。钱惟济也是钱俶之子，钱惟演之弟。

可惜，所有这些文集无一流传至今。现今传世者有《吴越钱氏传芳集》 据该书卷首的宋绶序言，《吴越钱氏传芳集》系钱惟演“纂其宗门歌诗之作”，内含“格律长言共四十五首”。钱惟演在编写时“每官诰之下躬自训解，概举其功行，标明其辞致”，则它的内容不仅仅是四十五首诗歌，且有钱惟演所作的这些诗作者的个人资料。后来钱惟演的族子钱仙芝又“纂为五卷，目曰后集”。可惜，钱惟演与钱仙芝所编原著不传于今。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总集》录《传芳集》二卷，云：“今此本乃忠靖公十二世孙楞所刊者，上卷自吾祖武肃王至浙东提刑，共二十四人，下卷自澹轩先生至石泉先生，共三十八人。总诗一百三十二首。”其篇目与宋绶所说不合，可见已非宋时原帙。今世间所传《吴越钱氏传芳集》亦非钱楞刊本，它是清人

钱泳从《全唐诗》、《续庆系谱》、《宋诗纪事》等书中采录而成。从钱镛至钱惟治，共集诗歌四十五首，以与钱惟演原编相合。钱泳在序中称，他曾看到过钱楞所刊《传芳集》，不知他为何没有刊布此书。由于《吴越钱氏传芳集》中所收的大部分诗歌都能从《全唐诗》、《宋诗纪事》得到，所以它的史料价值并不是很高。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全唐诗》、《宋诗纪事》中没有的内容，大概辑自《续庆系谱》，而后者今已不传于世，因而尚不可全然抛却，如其中所收钱元瓘《题得铜香炉并序》对研究吴越国的道教有一定参考价值。

此外，清人吴允嘉又编《吴越顺存集》二卷，是五代到宋钱氏子弟文章的总集。其中五代内容多见于《全唐文》，史料价值不大。

以上这些钱氏著述，最重要的当数《吴越备史》。今所传《吴越备史》皆署武胜节度掌书记范垞、巡官林禹撰。《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说：“吴越钱俨托名范垞、林禹撰。”《直斋书录解題》卷五《伪史类》说：“按《中兴书目》其初十二卷，尽开宝三年，后又增三卷，至雍熙四年。今书止石晋开运，比初尚阙三卷。”则《吴越备史》实是钱俨之作，初为十二卷，后增至十五卷。作于开宝三年（970），当时吴越还没有被宋朝吞并，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后世所传《吴越备史》或为四卷，或为五卷。四卷者，武肃、文穆、忠懿三王各一卷，忠献、忠逊二王合为一卷，或武肃为二卷，文穆、忠献、忠逊合为一卷，忠懿一卷。如《四库全书》本。五卷者，武肃王分为二卷。记事皆止于开宝元年（968），与十二卷本《吴越备史》并不相合。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二《史》录《吴越备史》四卷，谓：“今本《吴越备史》武肃王十九世孙德洪所刊。序称忠懿事，至于戊辰，因命门人马慈臣续第六卷为补遗。余暇日以家藏旧本校阅之，知其刻之非也。是书为范垞、林禹所撰，称忠懿为今元帅吴越国王。自乾祐戊申至端拱戊子，纪王事，始终历然。新刻则于乾德四年后，序次紊乱，脱误孔多。翻以开宝二年后事为补遗。他如王因衣锦城被寇，命同玄、玄同、先生、闾丘方远，建下元金篆醮于东府龙瑞宫。其夕大雪，惟醮坛

上星斗灿然，一黑虎蹲宫门外，罢醮乃去。罗隐师事方远，执弟子礼甚恭。及迎释迦舍利，建浮图以供之，其制度皆出王之心匠，诸事皆失载。其字句纰缪处，又不知其几何也。盖德洪当日所见，乃零断残本，实非完书，以家王故事，急付剞劂，故未遑细心参考耳。”钱德洪为明人，可见《吴越备史》至明时已非完本，很多内容在流传与重新编写的过程中佚失了。如《吴郡志》卷一四《园亭》东庄条材料注云引自《九国志》与《吴越备史》；《咸淳临安志》卷六五《人物·崔仁冀》注云“以《长编》及《吴越备史》修”但今天传世的《吴越备史》根本没有提到东庄与崔仁冀。

除《吴越备史》外，还有《备史遗事》可以称之为《吴越备史》的姐妹篇。《直斋书录解題》卷五《伪史类》：“《吴越备史遗事》五卷，全州观察使钱俨撰，俶之弟也。其序言《备史》亦其所作，托名林、范，而遗名坠迹，殊闻异见，阙漏未尽者复为是编。时皇宋平南海之二年，吴兴西斋。序盖开宝五年也。”其成书时间比《吴越备史》晚了两年。可惜今已失传。现在传世的有一本《吴越备史补遗》，据上引钱曾《读书敏求记》，乃明人钱德洪命其门人马荇臣所作。

《吴越备史》是类似实录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但因是钱氏子弟所著，要为尊者讳，在很多问题的记述上难免避重就轻，虚美隐恶。如对一些战争的记载，记胜不记败；又如，为了说明钱氏霸权兴起是天命所归，书中记录了不少荒诞不经的神奇传说。此外，书中自相矛盾和错误的记述也有不少。与《资治通鉴》相比，在叙事的客观性、准确性上大为不如。

但是，《吴越备史》毕竟是当代人修当代史的作品，在对一些中性事件的叙述上，内容相对丰富而准确；即使在一些有关吴越国王道德评价的事件中，它的记述也有其他史书所不能替代的参考作用；《资治通鉴》即有不少内容取材于此。可以说，《吴越备史》与《资治通鉴》同样重要，它们都是我们今天研究吴越国史最基本的史料来源。现在有关吴越国的史料总起来说是前期丰富，后期匮乏，这

在很大程度上与吴越国到太平兴国三年(978)纳土而《吴越备史》只记载到开宝元年(968)有关。

私家著述过多造成的最大的弊病即是史料失实,刘恕就认为:“钱元瓘子信撰《吴越备史》、《备史遗事》、《忠懿王勋业志》、《戊申英政录》弘侔子易撰《家话》 俶子惟演撰《钱氏庆系图谱》、《家王故事》、《秦国王贡奉录》 故吴越五王行事失实犹多 虚美隐恶 甚于他国。”^①但类似的现象在正史中其实也是存在的。如《宋史》其中有关吴越部分大概是直接或间接依据国初的实录、国史修撰而成 与传世的《太宗实录》残本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相比 大同小异,用同一个口径说话。宋朝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的圣明伟大,比较突出地记载了吴越国重敛虐民的一些事实,我们不能说这些记载是错误的,但似乎有失偏面。

此外,常为研究者所注意的还有清人吴任臣所撰《十国春秋》。此书的取材以《资治通鉴》为主 兼及正史、方志、笔记及各类碑铭,由于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我们能找到史源,或更为原始的记载,因而其史料价值十分有限。但里面有一些今已失传、或难以看到的史料 故其作用仍不可忽视 而且,《十国春秋》收罗甚广 有便于检阅的优点。

除上述这些常用史料外,还有三类文献对吴越国史的研究有很高价值 即方志、笔记与佛教、道教资料。

宋朝修过几部全国性总志 如《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等 里面就有与一些吴越国有关的记载。两浙是文化发达地区,方志的修撰在全国首屈一指,尤其是宋元时代的几部传世方志,大部分都出自两浙,且其时距吴越国纳土归朝不远,其中保存了很多与吴越国有关的史料,如范成大《吴郡志》中节录了郑璠

^①《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后唐庄宗同光元年二月条《考异》,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9册,第8880页。

《水利书》，我们现在关于吴越国太湖流域圩田的种种推想，凭藉此书才得以实现；又如《临安三志》中的一些记载，为我们今天确定吴越首府杭州城址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至于吴越国的行政区划，离开了这些方志材料，更是无从下手。而且，有些方志著录一些非常可贵的碑铭文字如《至元嘉禾志》卷二四《碑碣》载谢鹞《义忠佐正匡国功臣故节度左押衙亲卫第三都指挥使静海镇遏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御史上柱国朱府君墓志铭并序》，对研究吴越国开国时期的历史与制度极有价值。

后人所作的一些笔记中也留下了一些有关吴越国的史料，记载比较多的有三类：一是有关罗隐的一些事迹；二是有关钱俶与吴越国纳土归宋时候的一些史事；三是关于吴越国经济、技术的一些记载，如秘色瓷、捍海塘、匠人喻皓等。但笔记所记多为道听途说之辞其中多有错误的记载如《涑水记闻》、《东轩笔录》、《石林燕语》都有宋太祖时钱俶入朝的记载。钱俶入朝本是宋灭南唐之后的事，但它们却将它置于宋灭南唐之前。又如《罗江外纪》，将罗隐之误作罗隐。当然，这些笔记也不可全然废弃。中国的正史、编年史多局限于政治史的领域，有关经济、社会、技术方面的记述极其缺乏，而一些笔记中常有这类材料。如欧阳修《归田录》、文莹《玉壶清话》、沈括《梦溪笔谈》等中关于吴越匠人喻皓的记载 赞宁《传载》、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钱氏捍海塘的记载，是我们研究唐宋时期的建筑、水利技术的宝贵资料。

有关吴越国佛教、道教方面的史料也特别丰富。举佛教为例，除了上文所列举的那些实物资料外，由于两浙地区自吴越之后即成为中国的佛教中心，而且宋初所修的两部佛教大书《宋高僧传》和《景德传灯录》都是由两浙地区的僧人编写，留下来的佛教史料就远较他处为多。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宋僧宗晓所编的《四明尊者教行录》内收《螺溪尊祖集》、《宝云振祖集》保存了与吴越国时期天台宗两大祖师羲寂、义通有关的一些原始文书、碑铭，极其可贵，

对吴越国时期天台宗的研究有极高价值。除此三书外，宋人还编写了大部头的纪传体佛史《佛祖统纪》，该书以记载天台宗的传承为主，附及其他佛教宗派。由于天台宗的祖地在两浙境内，而且吴越时期正值天台宗走向中兴，因此，书中有关吴越国佛教的记述甚多。但是，《佛祖统纪》考订有欠严谨，失实之处不少。此外，两浙地区，尤其是杭州，还有不少清人所修寺志，但这些史料多是第二手的，且多荒诞不经之说。在道教方面，则有南唐人沈汾所修的《续仙传》及元人所修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

总的来说，在吴越国的研究中，政治、文化的史料非常丰富，而经济的史料十分稀少。在政治的史料中，又以政治事件的叙述为主，而对吴越国典章制度的介绍则极为缺乏，有关吴越国制度的很多问题我们只能凭借一些零星的记录得出假设性的结论。文化史料方面，又以佛教、文学方面史料为多。在佛教的研究上，不但有大量的实物资料，也有卷帙不菲的僧传；在文学的研究上，罗隐有很多作品流传至今，而且后人有关他的记述也有不少。与此相反，经济方面的史料却极其匮乏，很多问题只能得出某种推测性的结论，更多的问题则连推测也无从谈起。

二 已有的研究成果

人们对五代十国历史的研究，发表文章已经不少，且有几部专著问世，如日野开三郎《五代史の基調》（《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二卷，三一书房，1980年）、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其凡《五代禁军初探》（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等。但总的来说，人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上不及唐，下不及宋，是一个薄弱环节。在已有的成果中，又以对五代的研究为主，对南方诸国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在这些南方国家中，由于史料较多，人们对吴越国的

研究成果还算是比较丰富的，下面就将这些成果分成五个部分加以评述，以见吴越国史研究的大概状况。

(1) 文献与综合史的研究

在文献整理方面，清人万斯同有《吴越将相大臣年表》与《吴越将相州镇年表》；今人徐映璞有《〈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补正》一文（见《两浙史事丛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该文依据《钱氏家乘》等材料对《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进行补正。

在史料的研究上，王国林的《钱氏宗谱浅述》（《钱镠研究》第5辑），讲到钱氏宗谱修撰的一些情况。此外，唐剑平有《钱文选先生》（《钱镠研究》第6辑）一文朱郁有《钱氏家乘与钱文选》（《钱镠研究》第6辑）一文，对《钱氏家乘》及其编者钱文选生平作了简单介绍。

对吴越国历史综合进行研究的，有倪士毅《治杭八六载、有国七二年——吴越国始末》一文（载《吴越首府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吴越首府杭州》还附有徐治中、倪德富所编的《五代吴越国大事记》。此外据《论古代中国》（周迅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一书的统计，日人桜井ハル子有《五代十国の吴越について》（《史苑》15，1967—2）一文，可惜无缘拜读。

迄今为止，有关吴越国综合史研究的最为全面、最为深入而最为成功的作品当数诸葛计、银玉珍所著的《吴越史事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该书是一部编年体作品，按年月编排，自咸通十三年（872）钱镠从军叙至宋端拱元年（988）钱俶去世，每条叙事之下附有不同的记载及作者的考证文字。该书收罗资料极广，自史乘至小说、文集、方志、碑刻等所在皆有，其中的考证也多审慎、精当，信而有据。该书问世之后，对吴越国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史料的引用上，此后问世的一些作品往往不能超出它的范围。当然，该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第一，部分史料没有一一注明出处，有些史料，如该书后周世宗乾德元年下俞让的一则墓志铭（309

页)至今未弄清它的来历。第二 征引资料虽广,但仍有不足 或有所偏颇。如其叙吴越与吴国、南唐的一些战争,多用吴越这方面的材料如《吴越备史》及《旧五代史·钱镠传》、《新五代史·吴越世家》及《九国志·吴越》等,而对吴、南唐方面的材料如《九国志·吴》、《九国志·南唐》及陆游、马令二部《南唐书》等,用得很少,常常不能反映战争的全貌与真相。又如吴越国是佛教之国,有关佛教的史料极其丰富,但《吴越史事编年》所引佛书仅《五灯会元》一书,其他如《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佛祖统纪》等等常见僧史皆未征引。且《五灯会元》中有关吴越的材料,大多来自《景德传灯录》,说不上是第一手的。又如吴越国的道教,《吴越史事编年》仅靠《吴越备史》及方志中的一些材料进行叙述,而没有注意《续仙传》等道史资料,也是其不足。第三,书中有些地方尚可商榷,如第 340~341 页记北宋太祖建隆四年事:“正月 己未 宋赐吴越战马、驼、羊等。是月 钱俶贡白金万两、犀牙各十株、香药十五万斤及金、银、真珠、玳瑁器等于宋。……十月,丁未,吴越遣钱惟濬入贡于宋,进贺南郊也。时宋将行南郊,钱俶乃遣其子惟濬入贡,进贺郊礼金银、珠器、犀象、香药皆万计 因侍祠南郊。”实际上 正月之贡与十月之贡是同一件事,这一点看一下《宋会要辑稿·蕃夷·历代朝贡》七之一与《宋史》卷一《太祖本纪》、卷四八《吴越世家》即可明白 但《十国春秋》将此分为两事,《吴越史事编年》复因其误而误。当然,以上种种缺点尽是吹毛求疵“吹”出来的,总起来说,此书迄今仍是有关吴越国史研究的最好作品。前人拓荒之功,不敢或忘!

(2) 吴越国政治史的研究

首先是对吴越国创立者钱镠的研究,有关论文甚多,且有专著问世。其论述内容大多涉及吴越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各个方面,实际上也是吴越国综合史的研究之作。1980年,台湾学者赵雅书撰写了《五代吴越的创造者——钱镠》一文《台大历史学报》7, 1980—12);差不多同时,1981年,大陆学者倪士毅、方如金也发表

《论钱镠》刊登在当年的《杭州大学学报》第3期上。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临安作家蔡涉所著《钱镠》一书。上述三项成果差不多同时问世，此后有关钱镠研究，不断有论文发表。1988年出版的《吴越首府杭州》，内有《东南重望，吴越福星——武肃王钱镠传略》一文，也出自蔡涉之手。1992年，临安市成立钱镠研究会，创立《钱镠研究》刊物不定期发行至今已出8辑，发表了不少有关钱镠的文章，如许扬本《论钱镠》（第1辑）《再论钱镠》（第2辑），蔡涉《开拓吴越，富甲东南》（第1辑），洪建平《浅谈钱镠》（第1辑）钱江潮《武肃王钱镠传略》（第2辑）朱馥生《保境安民造福两浙建都杭州的吴越国王钱镠》（第3辑）杨渭生《一剑霜寒十四州的东南雄藩钱镠》（第8辑此文原载《文史知识》1997年第10期）等。

综上所述，有关钱镠研究的成果已经很多，但重复的研究太多，浪费了不少研究者的智慧和精力；而且，大部分作品流于对钱镠生平事迹作简单的介绍，深入的挖掘似乎有所欠缺。

当然，在钱镠的研究上，近年来也出现一些饶有新意之作，如欧炆《英雄与富翁——吴越国王钱镠的心态分析》（《钱镠研究》第3辑）王国林《试析钱镠孝道的重心》（《钱镠研究》第7辑）。欧文原刊《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该文从钱镠的心理、气质着手进行分析，认为钱镠少壮时心态积极、开放，晚年则消极、保守，作者还对造成钱镠心态转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王文则从文物资料着手，从钱镠父、母安葬的不同得出结论，认为钱镠孝敬父亲重于孝敬母亲。此外，《钱镠研究》第7辑有王建华《试析关于五代吴越国王钱镠的异象传说》一文，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有关钱镠的传说进行分析。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论题。

其次是关于钱氏霸权的形成与吴越国的建立。《钱镠研究》上刊登过这方面的一些文章，如王国林《钱镠独霸浙江的努力》（第5辑），潘庆平《试析五代史上的两个临安人——浅谈董昌在钱氏立